

長江中游出土商代青銅器研究（四）

／萬全文

（四）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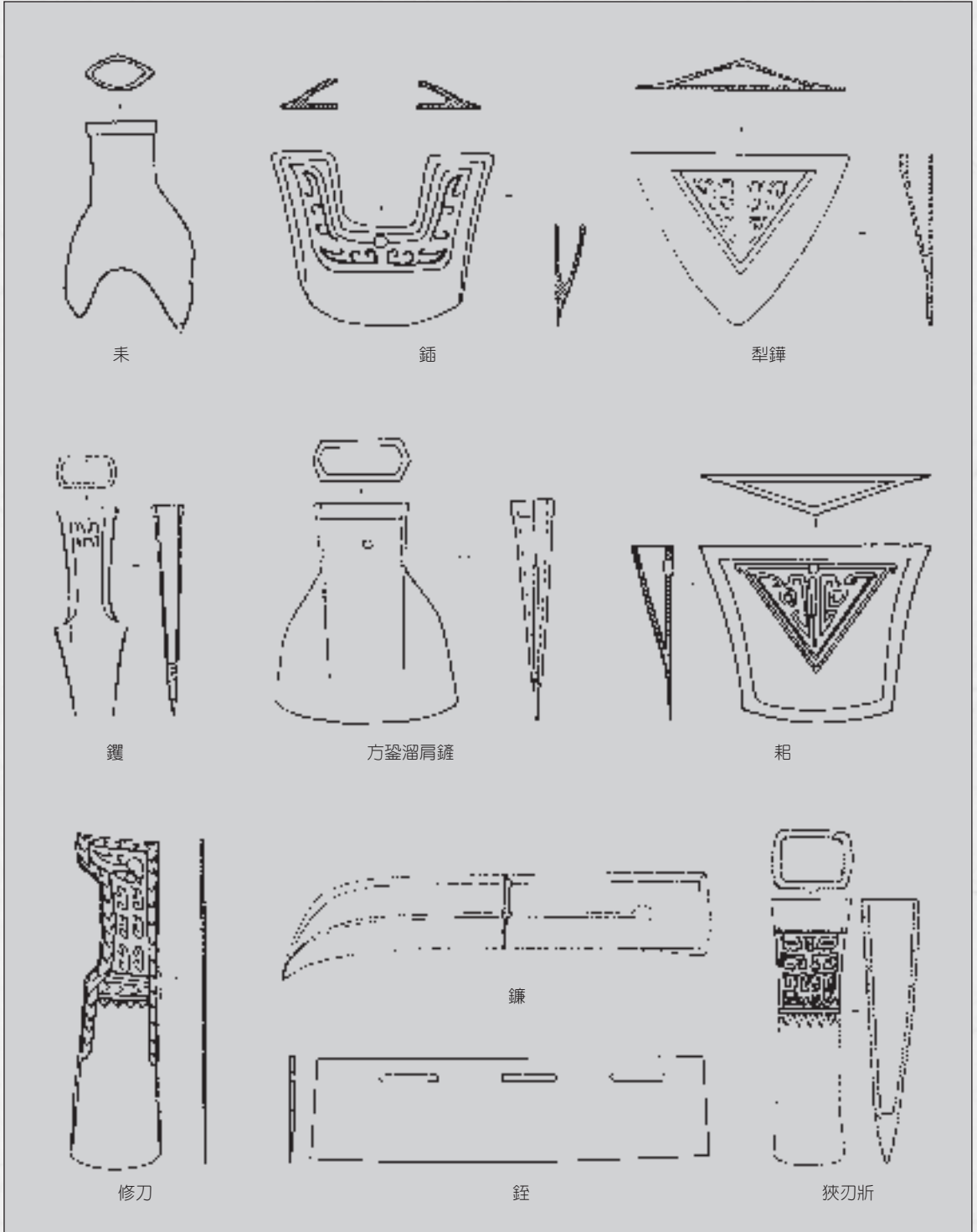
該墓共出土工具一百四十三件，有農業生產工具、手工業生產工具、漁獵工具。計有犁、鐮、耒、耜、鏟、鑿、斨、斨、斨、斨、魚鏢形器、修刀、鑿、刻刀、錐、刀、砧、手斧形器等十八種。其中的農具器類之全，數量之多，均屬罕見，尤其是犁、耨、耜、耜的發現為研究我國古代農業史、科技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圖二八）

犁二件，三角形寬體式，外形近似等邊三角形，兩側有薄刃，正面中部拱起，形成截面為鈍三角形的釜部，釜部正中有一穿對通，以繫釘固定犁鏵。兩面均飾有簡體式雲雷紋。標本三四二長一〇·七、肩闊一三·七、釜高一·九公分，重二三〇克，兩刃夾角六十五度，犁面與犁背夾角十度；標本三四三長九·七、肩闊一二·七、釜高一·六公分，重一六〇克，兩刃夾角六十度，犁面與犁背夾角十度。這種青銅犁鏵當是由石犁而來，它與新石器晚期以來江南地區流行的三角形石製破土器

相類似，有學者推定三角形石製破土器為石犁應是正確的。

石犁、銅犁和鐵犁，正與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相對應，說明犁耕在我國的歷史是悠久的。傳統看法是犁耕起源於春秋末至戰國時期，新淦商墓銅犁鏵的出現，這一傳統看法應加以修正。

據研究，如新淦出土的這種犁面與犁背夾角為十度的犁鏵在南方水稻田中耕作，所需牽引力約為二·六至七·八公斤，在一個人的正常拉力範圍內，因此，這種犁鏵的出土，並不能說明當時已產生牛耕。犁耕雖已出現，但較原始，因為它沒有配套的犁壁，只能鬆土、破土，不能翻土，不能提高精耕細作的程度，因而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犁耕。不過，這種犁的發明和使用，還是農具技術史上的一項重大革新，因為鏟、耨、耜等起土農具對土地的作用力是垂直力，利用槓桿原理將土翻起；犁對土地的作用力是水平力，其工作效率遠比耨、耜要高。（註二二）



鍤二件，均為斜坦凹口釜式。

耒一件，橢圓形釜，雙扁齒，其中一齒齒鋒殘缺，殘損約一公分，通長一二·七、齒距八公分。

耜一件，三角釜寬體式。平面呈等腰梯形，肩平齊，刃微弧，正面中部拱起，背面平齊，周邊略加厚，釜正中有穿對通。正背兩面均飾有卷雲、雙目組成的簡體獸面紋。長十一·一、肩寬十四·四、刃寬九·六公分。

耒、耜為商代主要的起土工具。《易·繫辭》說：「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

將耒、耜分為兩種不同的農具。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卻將二者混為一體，說：「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對後世影響較深。新淦耒、耜的出土，足以糾正《說文》之誤。

犁鏵和耒、耜在較原始的耕作條件下，各具優點，耒耜翻地，起土深，但速度慢，犁耜起土淺，但速度要快得多。這幾種農具同時出土於新淦商墓，可能是用其所長，並相互配合使用。

鍤十二件，均為溜肩鍤，有橢圓釜和方釜二種。可能是用於鋤草的農具。

耨一件，鍤三件，為起土、鬆土農具。

鍤三件，同墓還出土有一塊泥質鍤範。它源於本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有段石鍤，是一種廣為使用的起土、鬆土農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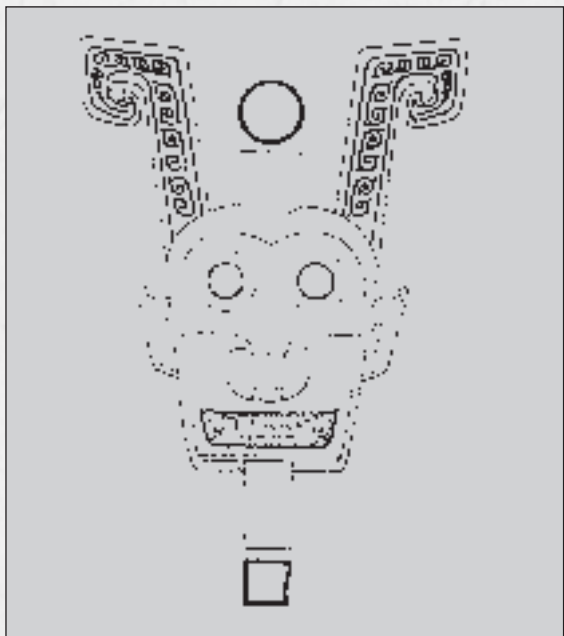
鍤一件，呈長方形，體甚薄，平肩弧刃，三長方穿，有夾柄痕，素面無紋。刃長二〇·五、頂長二〇、寬六公分。鍤是一種收割工

具，《釋名·釋器用》記：「鍤，獲禾短鐵也。」該鍤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一件。

鍤五件，長條形，前鋒下勾，體薄，單面刃，無齒；背部有隆起的脊，近內部有一穿，刃部有明顯的使用痕跡。這種早至商代的無齒式銅鍤的發現，在國內也屬首次。

上面所述的有起土、鬆土、除草、收割等各種不同功用的農具，是能保證當時農業生產所需的基本農具，而且部分農具還有使用痕跡，說明在商代時，贛江中下游地區已經開始使用青銅農具。

關於商周時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銅農具的問題，長期以來存有較大的爭議，這裡姑且不論。從新淦商墓出土大量帶有使用痕跡的青銅農具來看，表明該地區已經使用上了青銅農具。這裡大量使用青銅農具，既具備物質基礎，也存在必要性。其一，瑞昌古銅礦遺址的開採年代早至商代中期，充裕的銅料足以滿足鑄造農具的需要，這種優越的客觀條件是將可能變為現實的前提；其二，從必要性而言，江南地區「塗泥多草穢，而山出金錫，冶鑄之業，田器尤多。」（《周禮·考工記》）土質遠不如中原地區的疏鬆而易於耕作。由於耕作難度大，人們為獲取更多的生活資料，自然會利用予取予得的銅料來鑄造青銅農具以提高生產效率。或許正因為大量使用青銅農具，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使這支部族迅速崛起，並在贛鄱地區建立了以樟樹吳城地區為中心的強大政治集團。



圖二九 雙面人頭像 江西新淦商墓出土

顯然，青銅農具在商周時期是否使用，各地區並不能一概而定。條件具備者如贛鄱地區則大量使用，而銅錫資源比較缺乏的中原地區，有限的銅料主要用於鑄造禮器、兵器以滿足祀與戎的需要，青銅農具肯定不會被大量鑄造而得以廣泛使用。

(五) 雜器

新淦商墓出土雜器共四十八件，其中以雙面人頭像、伏鳥雙尾虎尤具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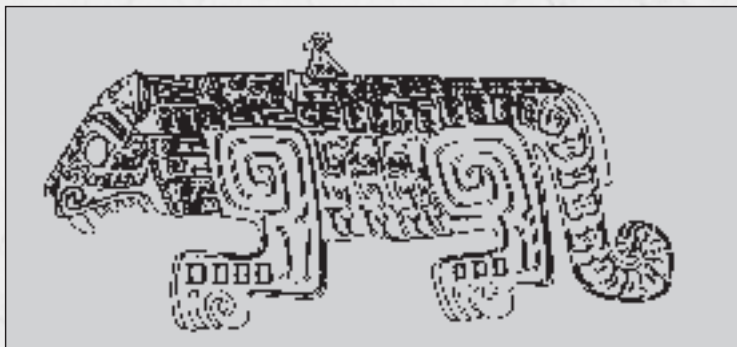
雙面人頭像一件，為中空的扁平形雙面人首造型，額部寬，頰部窄，呈倒置的等腰梯形。兩面均有內空的圓突目，豎耳上尖，肥鼻有雙孔，高顴，張口，兩側口角上翹，露齒，下犬齒外卷似獠牙，其餘均作長方鏟形；頭頂正中有圓管，兩側各出一角，角端外卷；器下有方釜。通高五十三公分。整個形象顯得猙獰、恐怖、詭怪。（圖二九）

以人首為題材的商代青銅製品出土甚多，如四川廣漢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即出土不少青銅人頭像、人面像等，但為十分寫實的造型。或者如陝西城固蘇村出土的二十三件銅臉殼，為單層的高浮雕式面具形器物，像新淦這種兩邊皆為人面的器物尚為僅見。在已出土的類似器物中，以城固銅臉殼與新淦的銅人面像在造型特點上較為接近，如標本七六：一四七狀近橢圓形，目眶深凹，眼珠外凸，中有圓孔，兩耳直立，耳廓上尖，有穿，懸鼻突起如蒜頭，有雙孔，張口，透雕尖狀牙。（註二四）其立面造型，以及耳、目、鼻、口、牙的形制特

點，與新淦人頭像基本相同。漢中地區在商代屬先周文化的範疇，而先周文化的勾戟、長條形帶穿刀也出現在新淦商墓中，因此，新淦人頭像狀若城固銅臉殼實為有源之水。人像的性質與功用，應是一種用於神靈崇拜的偶像或「神器」，是人與神靈溝通的工具。新淦、城固出土的此類器物如此相近，兩地文化的關係之密切是勿庸置疑的。

伏鳥雙尾虎一件，狀似虎尊卻又腹底不聯，張口咧嘴，左右各露一獠牙，凸目粗眉，雙耳豎立。粗頸，垂腹，背脊凸出，後垂雙尾，尾端上卷。背伏一鳥，尖喙圓睛，豎頸短尾。虎身遍飾陰刻花紋。整個虎形軀體龐大，怒目猙獰，虎視眈眈，作半臥欲縱之勢，生動逼真地再現了虎的威武形象。通長五十三·五、通高二十五·五、鳥高三·八公分，重六·二公斤。

(圖三〇)



圖三〇 伏鳥雙尾虎 江西新淦商墓出土

這件造型奇特的器物，雖是迄今已發掘出土的唯一一件，但在新淦商墓中出現卻並非偶然。在該墓出土的青銅器上，虎的形象十分普遍，既有十分寫實的立體雕猛虎造型和線刻虎紋，也有介於寫實與抽象之間的透雕虎紋，還有十分圖案化的抽象虎頭紋，即環柱角獸面紋和虎頭形簡體獸面紋。

僅就立體雕猛虎造型而言，除這件伏鳥雙尾虎之外，還有鼎耳伏虎，被鑄於三件方鼎和七件扁足鼎的雙耳之上，二十隻虎大小各有異，但造型一致，作似臥欲走之狀，頗富生氣。而線刻虎紋分虎首紋和行虎紋兩種。虎首紋趨於圖案化，分別飾於三件曲內戈的內部；行虎紋則僅見於箕形器柄部兩側，為陰線刻的側面虎形，頗為寫實，低頭、張口、展體，尾後拖，足略屈，作行走狀。透雕的虎形見於扁足鼎之扁足。環柱角獸面紋在新淦青銅器上也被大量使用，達三十二例之多。(註二五)

由此可見，在新淦青銅器上，虎是作為裝飾紋樣的主要母題而存在的。進而言之，虎是當地居民的崇奉對象。伏鳥雙尾虎或者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文化氛圍中的一件特殊產品。

概而言之，該墓出土器物不僅數量多，而且內涵非常豐富，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先周文化因素，還有土著吳城文化因素；既有較早的商代中期因素，又有近似於西周初年的因素。所有青銅器根據其所含文化因素，基本上可分為殷商式、融合式、先周式、土著式等數種類型。

在禮器中，以融合式最多，殷商式次之，先周式和土著式均較少；在兵器和工具中，則以土著式最多，其餘依次為融合式、殷商式和先周式。這也是在中原的周邊地區所出土的商代青銅器群中較普遍的現象。

融合式和土著式青銅器，無疑是當地土著居民在本地鑄造的。即使是殷商式青銅器，雖有可能部分是從中原地區傳入，但更多的還應是當地土著居民模仿中原殷商式青銅器而鑄造的。

(六) 青銅鑄造工藝技術

研究成果表明，新淦商代青銅器群與中國先秦青銅器屬於同一工藝傳統，即包括兵器和工具在內的所有青銅器都是用泥範塊範法鑄造的，或渾鑄，或分鑄鑄接。其工藝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較之於同時代的中原青銅器毫不遜色，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獨到之處。

分鑄鑄接法主要用於鑄造禮器，它是分別鑄造附件（附飾）和主體，再通過鑄接使附件和主體結合。絕大多數青銅禮器都是用分鑄鑄接法成形的，其中乳丁紋虎耳方鼎（XDM：八）和獸面紋立耳方鼎（XDM：九）就是採用全分鑄形式鑄成的，成為分鑄鑄接成形的典型代表。

具體言之，這兩件方鼎的鑄造程序分四步進行：先鑄鼎底，並鑄出與四足相應的鑄接孔；次鑄鼎腹四壁，並與鼎底鑄接；再於鼎底上鑄造四足，四足既疊壓鼎底，又疊壓四壁對

鼎底的包邊；最後鑄造兩耳上的虎形附飾，並與鼎耳鑄接。

爲了使各個鑄部件結合牢固，在鑄型工藝上分別設有加強結構：1、鼎底與四壁的結合，由四壁的卡口結構夾持鼎底；2、四足與鼎底的結合由鼎底內的環狀凸起與底外的扇形凸起夾持鼎底；3、虎形附飾與耳部的結合，先在鼎耳頂端預鑄結合孔，在澆注虎形飾時銅液進入孔中，凝固後形成鑄錒。（註二六）

與新淦方鼎的這種分鑄鑄接成形工藝相同的商代銅鼎，只有鄭州出土的四件二里岡期的大方鼎，而新淦方鼎的扉棱也採取分鑄鑄接法，是爲僅見，特色明顯。

芯撐的大量使用，更是新淦銅器群在鑄造工藝上的一大特色，也是許多精美的青銅器得以鑄造成形的重要體現。如方卣，在其腹內有通向四壁的十字形管道，且爲雙層底，外底有十字形鏤孔。或認爲如此設置，大概是可用炭火在底下加熱，又可浸入水中燙酒。同出的方鼎也是雙層底，有可以揭開的小門，也可能是便於置入炭火加溫。這兩件器物構思之巧妙，鑄造之精緻，在同時代的器物中尚未見到，可見鑄造者的工藝水平之高超。

在商代前期的青銅器中，芯撐的使用只是個別的現象，並且所發現的是使用了自帶泥芯撐，待器物澆注成形，去除泥範後，再對自帶泥芯撐的孔洞進行補鑄，而不是使用銅芯撐。在殷墟出土的大批青銅器中，也只是個別器物使用了銅芯撐，芯撐的使用量也很少，分布的

規律性也不強。直至西周早期，諸如寶雞漁國墓地青銅器中才大量地使用了銅芯撐，而且排列的規律性很強，成爲西周青銅器的一個基本特徵。（同註二六）可見，銅芯撐的使用有可能始於鄱贛地區，之後傳播到了中原地區，成爲中原青銅器鑄造中的一個關鍵工藝。

新淦商代青銅器群中有紋飾的器物，紋飾往往較深而完整，這樣泥範的製作難度就相應較大，對泥範的工藝性能要求也相應較高，非具備高超的泥範製作技巧是不能成形的。而高超的泥範鑄造工藝與分鑄鑄接法並列爲中國青銅器鑄造技術的兩大支柱。（註二七）

新淦青銅器群的材質主要爲銅錫鉛三元合金，而且雜質極少。從主要合金成分看，新淦青銅成分與二里岡時期高錫青銅或高鉛低錫均不相同，倒很接近殷末周初時期的青銅合金。從微量元素看，新淦青銅器雜質的含量不僅比二里岡和殷墟青銅器前期的要低，而且比殷末周初，乃至秦漢、明清時期銅合金的都要低（一般爲百分之二——三）。說明新淦青銅器的原材料是用很純淨的銅、錫和鉛配製而成的。（同註二七）

總之，新淦商代青銅器群反映出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水平，較之中原地區也不遜色。雖有某些新的或進步因素及地方特色，但仍屬於商文化的工藝傳統。

（七）青銅器的裝飾特點

在新淦商代青銅器群中，光素無飾的器物

極少。由於器物早晚有別，文化屬性有差異，決定了裝飾紋樣的豐富多彩，裝飾技法的多樣化。

裝飾紋樣稍加歸納，達二十四種之多，主要有獸面紋、夔紋、虎紋、鹿紋、羊首紋、牛首紋、鳥紋、魚紋、龜紋、蟬紋、龍紋、蛇紋、人首紋、目紋、雷紋、勾連紋、卷雲紋、刀羽紋、圓渦紋、連珠紋、燕尾紋、蕉葉紋、倒三角紋和扉稜等。而每種紋樣又有若干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構圖，其中，尤以獸面紋複雜多變。

獸面紋是這批青銅器最主要的裝飾紋樣，按其軀體的有無和表現形式的不同，可分爲展體、簡體、分體和省體四種。其中，以展體獸面紋最爲常見，一般飾於禮器上，紋樣通常以較細的陽線條勾勒。其構圖特點爲角、目、口、鼻、身、尾、足皆備，軀幹部向兩側橫向展開。乳丁凸目，中以細稜或勾戟狀扉稜作鼻，偶有低平鼻者；尾多上卷，亦有下卷或分列者；足作雲雷紋或卷雲紋狀，背上一般有刀羽紋；角的形狀可分爲環柱角、外卷角二式，環柱角者使用率最高，角多作半環狀，中間有短柱與額頂相連。而外卷角者，則角根豎直，角身平向外伸，角尖下勾，整個角的造型類似牛角，但回環多轉。其它如省體、簡體、分體獸面紋也是多有變化。

在這批豐富多彩的裝飾紋樣中，雖有一部分紋樣與中原殷商青銅器所飾相同或相近者，如夔紋、龜紋、蟬紋、目紋、雷紋、勾連紋、

卷雲紋、圓渦紋等，但也有一批深具地方特色的紋樣存在，如虎紋、鹿紋、燕尾紋等。

虎紋如前所述，虎因是作為裝飾紋樣的主要母題而存在，虎的造型和圖案，故被廣泛地裝飾於如禮器、兵器、雜器和藝術品之上，表現技法也十分複雜。

鹿的形象僅見於四足甌的雙耳之上，為寫實的立體雕塑造型。雙耳之上各立一隻幼鹿，形制小巧，軀體圓壯，直頸回首，雙耳高聳，四足直立，小尾上翹，腹下分別有代表性別的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兩鹿回首相顧，安詳寧靜之中透出幾分機警和靈氣。其以寫實和誇張相結合的手法，將幼鹿的純真、自然、質樸之美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

燕尾紋是前端呈三角形，後端分成雙尾，形如燕尾，故名，有線刻和鏤空、壓印等三種表現形式。線刻燕尾紋由陰線勾勒而成，一組組首尾相銜串成一條紋帶，施之於部分方鼎、圓鼎、扁足鼎等器物的口沿和耳外側。鏤空燕尾紋是將裝飾圖案部位的器體全鏤空，串成帶狀，見於環耳矛和鏤空匕形器。

此外，還有一些紋樣如人首紋、羊首紋、鳥紋、魚紋、龍紋、勾戟狀扉棱等，雖在其它地區的出土器物上可以見到，但在構圖方式、紋樣組成等方面具有地方特色。

總之，新滄青銅器群的裝飾紋樣可以分為三類：即見於中原殷商青銅器，且技法、構圖、風格基本相同的紋樣；具有地方特色的紋樣；見於其它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上，但具體構圖、視覺效果、裝飾風格和使用頻率有異的紋

樣。這三類紋樣的存在，既反映了中原青銅文化的南向傳播對吳城文化的影響，也反映了當地土著居民對外來文化的利用和改造。

新滄青銅器群時間跨度較大，大體上能以早、中、晚三期加以區分。上述三類紋樣的使用率隨著早晚的不同有著明顯的變化，或遞增，或遞減。據統計，早期五器，第一類紋樣使用六次，第二類紋樣未見使用，第三類紋樣使用九次；中期十六件器物，第一類紋樣使用二十四次，第二類紋樣使用四次，第三類紋樣使用十八次；晚期三十件器物，第一類紋樣使用十九次，第二類紋樣使用二十七次，第三類紋樣使用六十六次。（註二八）

從這些量化的結果可以知道，第三類紋樣即經過改造後的紋樣自始至終占有較大比例，說明文化的融合是趨勢所在。而第一類和第二類紋樣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係，表明中原殷商青銅文化影響力的逐漸減弱和地方土著文化的逐漸崛起、勃興。

新滄青銅器群豐富的裝飾紋樣，是通過各種裝飾手段來表現的，水平高超。以表現技法而言，有圓雕、浮雕、透雕和線刻等；以構圖手法而言，有寫實的造型，抽象的圖案，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半寫實作品；以鑄造方式而言，既有模作紋，也有範作紋，更多的是模範合作紋。

圓雕主要為附鑄於鼎、甌雙耳上的虎、鹿等動物造型，十分寫實，造型生動。它一般是以分鑄法單獨澆鑄成形，然後用渾鑄法鑄接於器體之上。

浮雕分爲高浮雕和淺浮雕，以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出現在器物上。其一，如壘（標本四十四）肩部的四羊首，方卣（標本四十七）、三足提梁卣（標本四十八）提梁兩端的獸首等，爲高浮雕，附鑄於器身的某一部位，形象也接近於寫實；其二，如柱足圓鼎（標本一）足部的裝飾，呈浮雕式的省體獸面，高勾戟狀扉棱鼻，「臣」字目，圓睛凸出，虎耳，紋樣線條突出，圖案立體感甚強；其三，如壘（標本四十四）、鬲形鼎（標本三十六）、壺（標本四十五）等器物由主紋、地紋、次紋構成的三疊或兩疊花紋，由於主紋粗而凸出，使紋樣具有浮雕效果。

透雕主要見於扁足鼎的足部，有虎形扁足、魚形扁足等，它是一種近似雙面雕的扁體變形圓雕，其構圖介於寫實和抽象之間，多單獨澆鑄，然後與器體鑄接成形。

線刻，即在器物表現以刻劃的線條勾勒出紋樣的圖案，是這批青銅器上使用得最多的一種表現技法，其紋樣題材豐富多樣，但構圖大部分非常抽象。線刻線條有陰文、陽文之分，以陽文爲主。但合瓦形腔鏡（標本六十六）卻是一件罕見的全陰線構圖裝飾的器物，其鏡體腔兩面外側滿布陰線刻的勾連雷紋和卷雲紋，不見一根陽線條，與橢圓形的大凸目形成鮮明的對比，具強烈的藝術效果。陰刻的線條流暢、深細，反映了鑄造工藝水平的高超。（同註二八）

新淦青銅器群的裝飾紋樣、裝飾題材豐富多彩，裝飾技法複雜多變，是反映鄱贛地區商代青銅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之一。

新淦商代青銅器群的出土，改變了人們的傳統看法。在鄱陽湖—贛水流域幾十年來的考古收穫中，是發現並確定了吳城文化，而吳城文化的青銅鑄造水平並不高，所謂的石範鑄造成爲一大特色。而新淦商代銅器群規模大，器類全，時代早，時間跨度長，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些足以讓人們改變傳統觀點，從而對於中原商文化的輻射力之強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對於各不同文化區域間的交流與傳播有著更深刻的了解。

長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三個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既相互聯繫而又各具特色，成爲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

（全文完）

註釋：

- 一三、彭明瀚〈江西新淦商遺存出土青銅農具淺析〉，《中原文物》一九九五年四期。
- 一四、唐金裕等〈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一九八〇年三期。
- 一五、詹開遜等〈初論新淦青銅器的地方特色〉，《南方文物》一九九四年一期。
- 一六、蘇榮譽等：〈新淦青銅器群技術文化屬性研究〉，《南方文物》一九九四年二期。
- 一七、蘇榮譽〈新淦青銅器群的科學價值〉，《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 一八、詹開遜：〈淺論新淦青銅器的裝飾特點〉，《考古》一九九五年一期。